

今年是巴金诞辰115周年,在巴金故居管理方的策划下,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一套小开本《巴金译文集》,包括巴金所翻译屠格涅夫、高尔基、迦尔洵、赫尔岑、斯托姆、克鲁泡特金等人的作品。创作和翻译犹如巴金的两翼,对其译作的重新整理出版,不仅完整了巴金的文学图景,也可从中觅得这位百岁老人曲折的人生经历和鲜明的思想轨迹。

# 巴金 在翻译的世界中战斗

## 贯穿一生的翻译事业

巴金原名李尧棠,1904年出生于四川成都的一个世代官宦大家庭,从小家境优越,受到了良好的教育。1920年,巴金考入成都外国语专科学校,阅读了大量英美原著,打下了很好的外语基础。这期间,巴金阅读了大量进步书刊。

在扑面而来的新思潮中,巴金对克鲁泡特金及其无政府主义思想(又音译为“安那其主义”)感触最深。他后来在《我的幼年》中写道:“后来我得到了本小册子,就是克鲁泡特金的《告少年》(这是节译本),我想不到世界上还有这样的书!这里面全是我想说而没法说得清楚的话。”

克鲁泡特金是俄国著名理论家,他的《告少年》(后巴金重译为《告青年》),节选自其作品《一个反抗者的话》,全文洋溢着强烈的反抗压迫、奉献社会、服务劳苦大众的精神。那种平等、互助、自我牺牲的精神理念,给了少年巴金“爱人类爱世界的理想”,并在日后贯穿了他的一生。其笔名“巴金”中的“金”,即来自于克鲁泡特金的汉译,从处女作《灭亡》起一直沿用。

1922年,巴金就曾尝试翻译了俄国作家迦尔洵的短篇小说《信号》(发表时署名“佩竿”),这是他的第一篇翻译作品。1927年,巴金赴法国留学,在法国继续翻译了克鲁泡特金的《人生哲学:其起源及其发展》,以及薇娜·妃格念尔的回忆录《狱中二十年》。1928年他回国从事文学编辑工作,创作了他的第一部小说《灭亡》。可见,巴金从事翻译工作的时间早于他的创作生涯。

上世纪30年代到1949年,是巴金



创作的黄金期,也是他翻译的黄金期,先后翻译了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父与子》和《处女地》、尤利·巴基的中篇小说《秋》、高尔基的短篇小说集《草原故事》、斯托姆的短篇小说集《迟开的蔷薇》、普希金的诗集《叛逆者之歌》、柏克曼的《狱中记》(节译)、王尔德的《快乐王子集》等。

70多岁高龄的巴金开始着手翻译赫尔岑的长篇回忆录《往事与随想》,这是他终生喜爱的一部大书。虽然因年老体衰,他只译毕前两卷(后在巴金的倡导和支持下,项星耀和臧仲伦分别完成了各自的译本),但《往事与随想》启发了他晚年最重要的作品《随想录》。

## 用“拣来的武器”战斗

“只介绍我喜欢的文章”,是巴金选

择翻译作品的一个标准;而“把别人的作品变成我的武器”,则是他从事翻译的冀望与目的。他曾写道:“我记得有一位外国记者问过我,作家一般只搞创作,为什么我和我的一些前辈却花费不少时间做翻译工作。我回答说,我写作只是为了战斗,当初我向一切腐朽、落后的东西进攻,跟封建、专制、压迫、迷信战斗,我需要使用各式各样的武器……我用自己的武器,也用拣来的别人的武器战斗了一生。”出身于封建大家庭的巴金,如他在“激流三部曲”中所写,亲眼目睹了太多旧制度镣铐下的惨剧,这让他终其一生都在厉声控诉黑暗的、压抑人性的制度。他用笔战斗,既用“自己的武器”,也向外求索着“拣来的别人的武器”。

巴金说“我平常最爱看一般人不愿看的书,因此我也爱译一般人不愿译的

书”,他选择翻译的作品,很多并不是人们熟悉的所谓“名家名著”,而是打动了他自己,能够与他气质相契合、思想相共鸣的作品。巴金的翻译作品在思想上大体有这样一些特点:一是充满人道主义,同情底层,站在弱者一边,强调正义的力量;二是充满反抗精神,对不合理的制度发起攻击;三是作品的基调充满热情,抒情性比较强。

## “向老托尔斯泰学习”

巴金并没有直接翻译过太多托尔斯泰的作品,但终其一生都和这座“十九世纪文学高峰”“十九世纪全世界的良心”保持着情感沟通。早在20世纪50年代,他曾从法文转译过高尔基撰写的《列夫·托尔斯泰》和《索菲亚·安德烈耶夫娜·托尔斯泰夫人》。晚年托尔斯泰厌恶贵族生活、选择为贫苦民众做事、81岁离家出走的经历,让巴金深为感触,也让他坚定了晚年坚持“说真话,言行一致”的选择。

1985年,巴金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他和我有天渊之隔,然而我也在追求他后半生全力追求的目标:说真话,做到言行一致。我知道即使在今天这也还是一条荆棘丛生的羊肠小道,但路总是人走出来的……托尔斯泰虽然走得很苦,而且付出那样高昂的代价,他却实现了自己多年的心愿。我觉得好像他在路旁树枝上挂起了一盏灯,给我照路,鼓励我向前走,一直走下去。

1994年,90岁高龄的巴金跟外孙女表白心迹道:“我说我要走老托尔斯泰的路。其实,什么‘大师’,什么‘泰斗’,我跟托尔斯泰差得很远,我还得加倍努力!”

(选自《北京晚报》)



历史随笔

## 李清照缘何叫“李三瘦”



李清照是宋代婉约词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这位多才多艺的女作家还有一个很特别的雅号——“李三瘦”。所谓“三瘦”是说李清照喜以“瘦”字入词,为词坛留下了三个含“瘦”字的传诵千古的名句。

第一个含“瘦”字的名句:“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如梦令》)女词人突破常规,匠心独运,把通常形容人或动物的“肥”“瘦”移用到花草上,写出了她爱花的情趣、惜花的情感、叹花的情态,语新意隽。李清照擅长寻常言语谱新声,赢得了历代文人的褒扬、赞赏。南宋文学家胡仔赞叹:“近时妇人能文词如李易安,颇多佳句……‘绿肥红瘦’,此语甚新。”(《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六十卷)清代词学家黄苏说:“而‘绿肥红瘦’,无限凄婉,却又妙在含蓄。短幅中藏无数曲折,自是圣于词者。”(《蓼园词选》)

第二个含“瘦”字的名句:“新来瘦,非干病酒,不是悲秋。”(《凤凰台上忆吹箫》)“诗犹文也,忌直贵曲。”(清·施朴华《峴佣说诗》)才力华赡的词人不直接说

“新来瘦”的缘由,而是以否定的句式来排除、作暗示,让读者思而得之,含蓄蕴藉。对“新来瘦”这个名句,明代文学家李攀龙评点说:“写出一种临别心神,而新瘦新愁,真如秦女楼头,声声有和鸣之奏。”(《草堂诗余集》卷二评语)

第三个含“瘦”字的名句:“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醉花阴》)“人比黄花瘦”的“瘦”字,与首句“薄雾浓云愁永昼”的“愁”字相呼应,以花喻人,形神相似,物我交融。这样营造了一个凄清孤寂的怀人情境,勾画出一幅清冷佳节、西风瘦菊、佳人兴叹、怜花自怜的画面,意境极美,意在言外,含蓄不露。当代词学大师夏承焘认为,“人比黄花瘦”这个警句中的“瘦”字是“词眼”,“归结全首词的情意”,凝聚了“全词精神”。(《唐宋词欣赏》)

李清照“三瘦”词句一写伤春的心绪,一抒离别的哀怨,一描独处的孤寂。它们从不同角度书写“幽愁”,奇俊新颖,语意工妙,给人异乎寻常的审美体验,因而名传千古。(选自《光明日报》)

## 拾遗

### 谷牧:率团考察拉开改革开放序幕

1978年5月12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谷牧率考察团访问了5个国家(法国、瑞士、德国、丹麦和比利时)的15个城市。考察结束,谷牧回国后,与考察团成员合力撰写提交给中央的考察报告。报告提出:我们应当把欧洲当作争取第二世界的一个重点地区。必须进行科技为主导的工业革命;加强技术交流,尽可能多派留学生到国外学习。6月底,邓小平约谷牧谈话,在听取汇报后说:“引进这件事要做,下决心向外国借点钱搞建设,要抓紧时间。”几乎与此同时,受谷牧委托的港澳考察团和罗马尼亚与南斯拉夫考察团也提交了报告。学西欧的科技,引港澳的资金,参考南斯拉夫计划与市场并行的经济体制。三路人马,三份报告,奠定了改革开放初期政策思路的雏形。

(选自《天津日报》)